

泰國華人國家認同問題

1910-1945

李道輯撰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胡春惠 教授

泰國華人國家認同問題

(1910-1945)

研究生：李道緝 撰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泰國華人國家認同問題
(1910-1945)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背景：早期的泰國華人	9
一、歷史上中、泰關係與華人移民的產生	9
二、早期泰國華人社會經濟結構	25
三、早期泰國王室對華人的政策與管理制度	37
第三章 蛻變之跡：20世紀前後新因素的出現	46
一、華人人口結構的改變	46
二、「中華」意識的浮現	55
三、泰國近代改革與1910年華人罷市事件	70
第四章 中國國家認同的建構：中國僑務工作的推行 (1912-1937)	82
一、由建交護僑到雙重國籍	82
二、中國國民黨的「國族」動員與僑社反應	106
三、中國華僑教育宗旨與泰國華校的發展	123
第五章 泰國「國族主義」運動下的華人政策(1910-1944年)	135
一、王室主政下的同化政策(1910-1932年)	136
二、1932年革命後的排華政策	147
第六章 戰爭與認同：抗日戰爭與泰國華僑	161
一、抗戰初期泰國華僑援華抗日活動	161
二、救國運動的困境與認同的選擇	176
三、日軍佔領下的華僑：「國際孤兒」的認同調適	185
第七章 結論	196
徵引書目	201

表 次

表 3-1 1882-1955 年華人進出暹羅人數統計-----	46
表 3-2 1825-1952 年華人「遷民」與「僑生」人口數與比例-----	47
表 3-3 歷年曼谷入境華人男女別（1921-1937 年）-----	48
表 3-4 暹羅雲氏家族各輩序在泰的婚姻情況-----	50
表 4-1 1928 年 4 月至 1929 年 3 月日貨輸入暹羅數額-----	116
表 4-2 抗戰登記備案僑團職員、會員人數及經費統計-----	118

附 錄

民國 19-36 年合法登記的泰國華僑團體-----	199
----------------------------	-----

第一章 緒論

20 世紀是一個「國族國家」(Nation-State)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盛行的世紀。自 19 世紀中葉以後，古老的中華帝國在西方船堅砲利為後盾的文化衝擊下，逐步放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天朝中心的國際觀，漸次吸取了西方國族國家的概念與意涵，轉而從事於較踏實的國族國家的建構。而在建構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族國家的過程中，如何將「人民」(People)塑造成國族(Nation)則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結¹。

然而，除了版圖之內的「人民」外，19 世紀中葉之後，在中國國境之外還存在著千餘萬的「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19 世紀中葉前的「海外華人」，被中國政府視為天朝的「棄民」，即不要的人民，任其在異邦自生自滅。但 19 世紀中葉之後，「海外華人」挾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與西方知識，在自強運動中對中國現代化運動有著深刻的影響，引起了清朝政府的矚目與爭取，開始有了近代中國的僑務工作，這應就是中國對「海外華人」「國族」建構工作的開端和起步。因此，除了型塑版圖之內「人民」的「國族」意識外，「海外華人」的國族塑造更是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頗為特殊的一個面向。

「海外華人」不同於國內「人民」，它不在中國的領土之內，不受中國的統治、管理，在以往長期「棄民」觀念下，「海外華人」幾乎形同無國之民。同時，長時期的居留他鄉異國，海外華人的情況遠比國內「人民」為複雜。首先，在血源上，由於早年婦女不出洋，海外華人多娶當地婦女為妻，而出現了混血的情形，華人與當地民族的種族界線因混血而逐漸消失，如經過數代的混血，則「華裔」在血源關係可能更親近當地民族，而成為「外國人」。其次，華人族群在當地多屬少數族群，故華人文化無時不遭到當地優勢族群文化同化的威脅，而使華人及其子弟逐漸喪失其華人的文化特質。三者，華人在海外謀生發展，其生命財產皆繫於當地，與當地有著休戚與共的關聯性，而與中國反較無直接關係。因而，「海外華人」與國內「人民」最大

¹ 有關晚清中國國族的建構論述請參考沈松僑著，〈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載《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 1895-1912》小型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7 年 6 月 20 日；沈氏著，〈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台北，1999 年元月 21 日。

的不同，在於它深受當地主客觀因素的制約，「中國」，對「海外華人」而言，有時僅是一個遙遠的、想像的「祖國」。

因此，當 19、20 世紀之交，遙遠的「祖國」與孤懸海外的「棄子」同時受到亞洲「國族主義」興起的影響，而重新要聯結起來時，雙方聯結的環結即在於中國對「海外華人」的國族建構及「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的反應，兩者的互動關係正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焦點。

近代「海外華人」遍布世界各地，受到各地不同環境的影響，每個地區的華人都展現不同的風貌。筆者選擇東南亞的泰國華人做為論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幾個因素：第一，華人遷移泰國有長久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至近代以來，泰國是華人人數最多的國家，也是民族融和最深的國家。第二，泰國是近代東南亞地區唯一沒有被西方列強殖民的國家，由於始終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華人移民的類型也與移往曾經是西方殖民地的華人移民類型有著不同。而更明顯的區別是，泰國的華人自始即直接受到當地土著民族的統治管理，土著民族與華人之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從未變動過。第三，近代中、泰兩國國家發展的歷程頗為相似，兩國同時受到列強的壓迫而對外開放，同時展開「現代化」的改革工作，亦同時受到 20 世紀「國族主義」的薰陶而進行其「國族」的建構工作。而且，兩國的「國族」建構工作又有一重疊的部分，即泰國的「華人」。換言之，20 世紀的泰國華人同時受到兩個國家的「國族」型塑。第四，中國與泰國雖同屬遠東國家，地理位置亦相距不遠，但自清末傳統朝貢關係中斷後，兩國一直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其徵結即在兩國對泰國華人身份認知的歧異。

以上四點，是筆者選擇泰國華人做為探討近代中國對海外華人國族建構的範例，從這一範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如何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去建構域外「華人」的國族意識；而泰國又如何提倡自身的「國族主義」，以抑制中國「國族主義」的挑戰；最後，則可以從泰國華僑在面對兩股截然不同的「國族」型塑時，他們作如何的反應，從而梳理出海外華人對「國家」認同的因應模式。

有關泰國華人的研究，目前仍以西方著作為主，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兩本著作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至今仍為研究泰國華人的經典之作，他尚有若干論文，如“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ic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136-147(Jan. 1959)、 “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Thai Politics ”,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237-250(1957)、 “The Thailand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 in

Asia, 2:80-92(1964)、「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East Asia, a Faculty Colloquiu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pp.86-100 等，皆是有系統的探討泰國華人的論著。Skinner 之後，有關的著作相繼有 Richard Coughlin, *Double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Modern Thailand*(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Richard J. Coughlin, *The Chinese in Bangkok: A Study of Cultural Persistence* (New York, Ph.D. Dissertation of Society, University of Yale, 1969)、David J. Banks, ed. *Changing Identity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Paris, Mouton, 1976)、Gacques Amyot, *The Chinese and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Bangkok, Institute of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ulalongkorn, 1972)、Dalad Lomatawekul,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in Thailand*(Bangkok, Theses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hulalongkorn, 1986)、Tong, Chee Kiong, *Perceptions and Boundaries: Problematics i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ailand*(Singapore,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8)等。至於國內研究泰國華人的學術著作則較稀少，僅有戎撫天著，〈泰國華人同化問題研究〉（台北：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66 年）、龐新竹著，〈泰國華人經濟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68 年）、筆者著，〈清末民初潮州人移殖暹羅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9 年）等三篇碩士論文。而在中國大陸方面，海外華僑華人史的研究近年來呈蓬勃的發展，但因受時空與經費的限制，其研究重點多集中於國內華僑史的範圍，如中國的僑務政策、華僑與辛亥革命、華僑與抗日戰爭、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等方面，對於泰國華人的研究，僅見若干編譯出版，如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泰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王偉民編譯，〈泰國華人面面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泰國歸僑聯誼會《英魂錄》編委會編，〈泰國歸僑英魂錄〉（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年）、泰國歸僑聯誼會《湄江風雲》編委會編，〈湄江風雲－泰國華僑抗日愛國活動回憶錄〉（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 年），較具學術性的著作尚未見聞。在泰國方面，中文書籍原已極少，學術著作更絕無僅有，除一般僑團之特刊、紀念集外，僅泰國黃埔校友會編，〈鐵血雄風－泰國華僑抗日實錄〉（曼谷：泰國留華學會，民國 80 年）一書，較具參考價值。至於泰國華人的論文著作則相當的多，散見於各個學報期刊之中，請參見徵引書目。

從以上的研究成果可知，較具規模的著作仍以西文為主。而綜觀西方研究泰國華人的取向，仍遵循著 60 年代以來 Skinner 所倡導的「同

化論」觀點，認為泰國華人同化於當地社會和民族，不僅是歷史上普遍的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這種研究取向，使西方學者較著重於五、六十年代之後的同化趨勢，而忽略了在此之前，泰國華人的中國認同傾向的啓發。此外，「同化論」者是站在大民族、統治民族和本地民族等主體民族的立場看問題，要求其他小民族、被統治民族和外來民族放棄自己的民族特性，融入主體民族之內。可以說，西方「同化論」的觀點，主要受到美國學術思潮中「融爐論」的影響²。但是，「同化論」在 60 年代亦遭到不少學者的質疑，Couchlin 即不同意 Skinner 的同化觀點，他在 50 年代初也在泰國進行實地調查，認為與其說泰國華人大多已被同化，不如說華人自己自認為是泰國人，也是華人，他們具有「雙重身份」（Double Identity），或稱「雙重認同」。而隨著國際學術思潮從「融爐論」轉移到「文化多元論」後，「同化論」已成一過時而陳舊的觀點，從族群主體認知出發的「認同論」，成為研究族群問題新的切入點。因此，對於泰國華人的研究，有必要以「認同」的觀點加以重新檢視。其次，由於早年中國政府檔案不開放，因而使學者較少研究到 20 世紀前半葉泰國華人與中國政府間的互動關係，故對戰前中國政府在爭取華僑認同上的努力，及華僑對中國認同的反應，較少述及。因此，本論文的目的即從「國族建構」及華僑「國家認同」的觀點，嘗試針對這段史實加以填補，以明瞭在 20 世紀前半葉「國族主義」盛行的年代，泰國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互動情形。

「認同」問題牽涉範圍非常廣泛，諸如青少年的偶像認同、社區文化的社區認同、語言族群的方言群認同、種族的認同，文化的認同，乃至國家認同，都屬其研究的領域。然而，研究「認同」問題的學者，多屬心理社會學或人類文化學者，他們對「認同」的理解，多傾向認為「認同」是心理趨向或情感歸屬的反應，例如學者麥留芳即認為「方言群認同則是有關社群其心目中共同享有的一個意識。比方說，客家人是指說任何一種客家話的社群，而他們之中彼此都知道誰才是客家人」³。但是，對於「認同」的解釋，愈來愈多的政治學者認為人的「認同」概念是由外在環境所塑造的，布雷斯（Paul R. Brass）在研究種族認同時，即認為種族認同本身是可變化的，而非一成不變的，而這種可變性的基本動力來源是來自較寬廣的政治與經濟環境，而非族群的文

² 丘立本著，〈同化論思潮的衰落及其原因〉，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88 年 2 期（1988 年），頁 4-5。

³ 麥留芳著，《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 74 年 9 月），頁 15。

化價值⁴。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更認為國家認同並非一般的認同，它是一種特殊的認同，認同的產生可能是一種心理需求或是人類的本能，但國家認同的產生則絕對不是如此⁵。王明珂也強調：

影響個人族群身份選擇的因素，主要是社會族群生活經驗、現實利益（資源競爭），以及對未來利益的預期。但過去的經驗不是毫無條件的成為個人的記憶，事實上族群認同是以強化「選擇性」集體記憶來凝聚。這選擇，不只是由個人的意志，而更像是經由社群中的長者或精英份子所作的選擇，因為他們認為是有能力詮釋當前及未來的群體利益的人。對社會整體而言，凝聚族群認同可由集體活動以強化集體記憶來達成。相反的，認同變遷也由結構性健忘來達成。⁶

換言之，對於「國家認同」而言，「建構」與「認同」是一體的兩面，國家會運用日益強勢的政府機器，來灌輸國民應有的國家意識，特別是透過教育體系，來傳播國族的意象與傳統，要求人民認同國家及所有代表國家的象徵⁷。因此，雖然有政治學者吳乃德曾將「國家認同」與「國家選擇」加以嚴格區分，他認為基於情感取向所產生的對國家的歸屬感，是為「國家認同」；基於理性的利益考慮，以該國能否帶給他現實利益來決定是否願意成為其國民，是為「國家選擇」⁸。但由於情感與理性的區別不是很容易判定，兩者也非截然劃分，同時，國家對人民的國家認同要求，係依人民外在行為做為判定標準，如對代表國家的神聖表徵（國旗、國號、國籍、肖像等）的承認等，這是無法用感情加以辨別的。因此，本文的「國家認同」意涵，包括有情感取向與理性取向在內，僅在有必要加以區分時，直接以「情感的」或「理性的」加以區分。

⁴ Paul R. Br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eory and Comparison*, (New Delhi,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1991), p. 13.

⁵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

⁶ 王明珂著「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族群經驗」，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1994年6月），頁260。

⁷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年6月），頁123。

⁸ 吳乃德著，〈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載於張茂桂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民國82年，頁9。

除了「國家認同」的界定外，本文須對若干名詞作一說明。首先，關於「華僑」的定義，歷來華僑史學者都各有一套解釋，並沒有獲致一定的共識⁹。本文研究的主題，在於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認同建構，因此，對中國政府的立場而言，所有具有華人血統的海外華人都是「華僑」，且在 20 世紀前半葉，國人亦習慣以「華僑」稱呼海外華人。故本論文所指稱的「華僑」，泛指從中國遷移出去，具有中國國籍的華人及在當地出生的「華裔」。此外，「海外華人」係由英文 Overseas Chinese 翻譯而來，係指稱在中國領域之外的華人，而非僅字面含義「海外」的華人。「遷民」（China-born Chinese），係指在中國出生，再遷移至僑居地的華人，「僑生」（Local-born Chinese），係指在當地出生的華人等。其次，則是英文 Nation 及 Nationalism 二詞，通常譯作「民族」及「民族主義」，但「民族」一語，於漢語中頗多歧義，往往兼包種族、族群等不同層面的意涵，混淆難辨。故現今漢語界多以「國族」及「國族主義」對譯 Nation 及 Nationalism。不過，由於源引的史料，大抵仍沿襲「民族」的舊名，為求行文方便，不擬另加更動，一體混用，故文中「國族」、「民族」、「國族主義」、「民族主義」等用語，概為 Nation 及 Nationalism 之意¹⁰。最後，則為泰國國名、族名的使用，在 1939 年 6 月 24 日之前，泰國國名為「暹羅」（Siam），族名為「泰」（Thai），之後國名改稱為「泰國」（Thailand），族名仍為「泰」，1945 至 1949 年間，曾一度改回原名「暹羅」。因此，本論文於行文中，依據當時的國名稱呼該國。

至於本論文的研究架構，筆者擬將泰國華僑放在泰國這個大環境

⁹ 有關各家對「華僑」的解釋，請參考李盈慧著，《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台北：國史館，民國 86 年 5 月），頁 11-14。鄭民著，〈華僑概念、定義問題初探〉，載[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編，《東南亞研究》，1988 年 3 期（廣州：編者刊，1988 年），頁 66-71。朱育友著，〈“華僑”名稱探源〉，載[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編，《東南亞研究資料》，1986 年 4 期（廣州：編者刊，1986 年 12 月），頁 1-3。溫廣益著，〈華僑、華人的含義及華僑史的分期〉，載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華僑華人歷史論叢》，第 1 集（廣州：編者刊，1985 年），頁 1-5。廖建裕著，〈東南亞華人：華僑？海外華人？或東南亞人？〉，載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編，《東南亞季刊》，3 卷 1 期（埔里：編者刊，1998 年 1 月），頁 20-46。

¹⁰ 有關「國族」、「民族」的討論，請參考沈松僑著，〈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台北，1999 年元月 21 日。

中加以探討，從兩個國家的國家機制對泰國華僑進行國族的建構切入，探討泰國華人國家認同概念是如何由外在主客觀條件的刺激，由啓蒙而發展，並且在面臨不同的主客觀條件時，華僑的國家認同做如何的肆應調整，從而明瞭 20 世紀前半期「國族主義」盛行時期泰國華僑國家認同的情形。因此，在撰寫論文過程中時，除運用既成的研究著作外，將著重於使用中國的檔案資料。故在此對現有的檔案資料做一簡單的介紹。本論文計劃使用的檔案資料有四個來源：第一，國史館館藏的僑務資料檔。國史館典藏之僑務檔案，已做成微卷者計有 641 卷，泰國華僑相關檔案散見其間，詳見徵引書目。第二，黨史會藏泰國資料檔，主要集中於「特種檔案」，計有《暹羅排華事案》等 19 種 36 卷。第三，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外交檔《暹羅華僑案》3 卷。第四，泰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早期泰國華文報紙，如《中原報》（民國 27 年創刊）。這四方面的檔案資料提供非常豐富的一手史料，對於本論文之研究工作的開展助益不小。

最後，本論文的時間斷限是 1910 年至 1945 年。1910 年對中、暹兩國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在中國方面，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夕，海外華人的國族主義正因革命的風潮而風起雲湧。而在暹羅方面，1910 年底，將暹羅建構成爲一個現代「國家」的五世皇去世，具有強烈「國族」意識的六世皇即位，象徵著暹羅邁入了建構泰國「國族」的新紀元。而對暹羅華僑而言，更具重要時代意義在於 1910 年 6 月暹羅華人爆發大規模的罷市事件，這個事件使傳統以來暹羅華人與暹羅政府間的互利共生關係出現裂痕，雙方在各自的國族主義驅策下，漸行漸遠，1910 年暹羅華人罷市事件，無論是巴素（Victor Purcell）所標示的，是中泰兩民族「不和諧的肇始」¹¹，或是 Skinner 所說的：「華人問題」的浮現¹²，在在說明了 1910 年是暹羅華人的「國家認同」邁入一個新時代的里程碑，是以本論文以 1910 年爲上限。至於以 1945 年爲下限，一方面是部分華僑史學者在爲「華僑史」分期時，常以 1945 年作爲一個斷限，認爲近代華僑史在 1945 年之前，是華僑社會進一步形成和發展壯大的時期，而 1945 年之後則是華僑社會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¹³。另一方面，自 1869 年暹羅中止傳統的朝貢關係後，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中泰兩國屬於無邦交時代，中、泰兩國在無邦交

¹¹ 巴素（Victor Purcell）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上冊）（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63 年 8 月，臺 4 版），頁 209。

¹²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59-163.

¹³ 溫廣益著，〈華僑、華人的含義及華僑史的分期〉，載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華僑華人歷史論叢》，第 1 集，頁 4-5。

的狀態下各自競逐於對泰國華僑的「國族」建構工作。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泰兩國開始議訂邦交，並於次年（1946 年）初雙方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泰國華僑的「國族」建構與「國家」認同進入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時代，是以本論文以 1945 年做為討論的時間下限。

第二章 背景：早期的泰國華人

一、歷史上中、泰關係與華人移民的產生

中國與泰國¹在歷史上的接觸為時甚早。早在漢代以前，中國與南

¹ 泰國 (Thailand) 這一國名，是在 1939 年 6 月 24 日泰國政府頒布的第一個通告，確定國家、民族、國籍的名稱為「泰」，英語名稱為「Thailand」，民族和國籍的名稱應為「Thai」，「泰國」才成為當代各國稱呼統治這個地區政權的國名，「泰人」成為居住在該地區的民族。在此之前，這個地區有各種不同的政權，各種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於今的政治版圖。當代所知道的泰國地區最早的國家是三國時期位於泰國中部（昭披耶河以西）的金鄰國（孟族），及昭披耶河以東的扶南國（吉蔑族），三世紀初，扶南逐漸強大，併吞鄰近國家，包括金鄰國在內，奄有整個泰國版圖，六世紀初，扶南是東南亞最強大的國家。六世紀中葉以後，扶南逐漸衰微，在中國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泰國南部出現了盤盤、狼牙修、赤土等國（皆孟族），中部則有墮羅鉢底國（又稱「頭和」、「投和」、「墮和羅」、「獨和羅」、「杜和羅」、「杜和羅鉢底」等，均為 Dvarapati 或 Dvaravati 的漢譯名稱）（亦孟族）。七世紀初，真臘國（吉蔑族）代扶南而起，上述諸孟族國家又成為真臘的屬國。十二世紀初，在湄南河下流，以現今泰國華富里為中心興起一孟族人所建立的國家，即中國史籍所記載的羅斛國，起初，它亦是真臘的屬國，但十三世紀以後，在真臘帝國衰落時，羅斛趁機起而獨立。與此同時，1238 年，原隸屬於真臘帝國的邦央泰族首領坤·邦克朗刀亦率領泰族人民起而反抗真臘的統治，於泰北素可泰城建立了素可泰王朝，即宋末元初中國史籍所稱之暹國（或速古台、速孤底，皆 Sukhothai 之漢譯名稱），以泰族為主體的國家開始出現於東南亞的歷史舞台上，而最早記載泰國史實的文字資料，亦於此時期（1293 年）開始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素可泰王國的人民從來不稱自己的國家為「暹」，而是叫「孟泰」，意思是泰人之國，或是以首都為國名，即素可泰王國。「暹」原係梵文名詞 Siam、Syam、Sayam 的漢語譯音，最初它是印度人對泰國地區，特別是對湄南河流域中部和北部地區及其泰族居民的稱呼，後來為泰國鄰近各國各民族所襲用，中國從宋末元初起，就把聽到的 Siam 一詞譯音為「暹」，稱呼湄南河中流的素可泰王國為「暹國」，其人民為「暹人」。

十三世紀末葉，素可泰王國勢力逐漸向湄南河下流地區擴展，消滅了湄南河下流以華富里為中心的羅斛國，第一次實現了泰國的統一。1296 年，周達觀隨同元朝使節前往真臘，次年歸國寫成《真臘風土記》一書，稱真臘西邊鄰國素可泰王國為「暹羅」，稱那裏的居民為「暹人」，這是中國史籍中第一次使用「暹羅」來稱呼這個地區的國家。十四世紀，在湄南河下流阿

海的貿易活動，雖無確切的史料記載，但從文獻中也反映了秦始皇的進軍嶺南，就是爲了獲得那裏的犀角、象齒、翡翠及珠璣等珍寶²，但這些珍貴物品並非嶺南所產，必定是嶺南越人與南海貿易而來。因此，據學者推測，在公元前二世紀時，由於漢人對南方產物的需求，鼓勵了秦、漢帝國向南方沿海擴張，與政治版圖擴張的同時，珍奇貿易也將漢族商人帶進了南中國海。在另一方面，當時南方的越人及漢人水手已經裝備得很好，可以沿著印度支那海岸向南航行，一直駛入暹羅灣，這觀點雖然沒有任何史料可以加以證實，但這個推論仍屬合乎情理³。到了漢代，嶺南的番禺（今廣州）更成爲珠璣、犀、玳瑁、果、布的貿易中心⁴，顯示在漢武帝時期，嶺南地區已與南海存在密切的貿易往來。因此，在《漢書》〈地理志〉出現了中國對東南亞各國最早的描述記錄，其文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

瑜陀耶（大城）一帶，興起一個新政權，這個新興政權日益強大，於 1349 年左右取代了素可泰王國，建立了阿瑜陀耶王朝。而中國史籍誤把這個新興政權認為是十二世紀初建立的羅斛國，故一度將阿瑜陀耶王朝稱為「暹羅斛」，至明洪武 10 年（1377 年），明太祖賜其「暹羅國王」印，中國才確定使用「暹羅」一詞來稱呼阿瑜陀耶王國，此後雖歷經了吞武里王朝及現今之曼谷王朝政權的更替，中國均使用「暹羅」來稱呼它，一直到它更名為泰國為止。

十六世紀西方國家進入東南亞地區後，沿用周圍國家對泰國及其民族的稱呼，也稱其為 Siam（漢譯「暹羅」）。但無論是素可泰國、阿瑜陀耶或曼谷王朝初期，泰國人仍稱自己的國家為「孟泰」，在 1826 年 6 月 20 日泰英簽訂「泰英友好通商條約」（又稱「伯尼條約」）及 1855 年 4 月 18 日簽訂第二次「泰英友好通商條約」（又稱「鮑林條約」）時，泰國政府仍然使用「孟泰」這個名稱。但在 1855 年「鮑林條約」時，英國就已把 Siam 這個他稱強加給泰國，次年（1856 年）4 月 5 日，泰國政府在批准上述條約時，第一次使用 Siam 代替「孟泰」來稱呼自己的國家，此後，Siam（暹羅）便成為泰國自己使用的國名，一直到 1939 年更改國名為泰國（Thailand）為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泰國政府於 1945 年 9 月 8 日一度恢復暹羅國名，1948 年 8 月再次改國名為泰國，一直沿用至今。以上國名演變情形，請參考鄒啟宇著，〈古代泰國的國家和國名〉，載鄒氏編，〈南洋問珠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月），頁 170-177。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泰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頁 8-10、26-31、[英]D. G. E. 霍爾（D. G. E. Hall）著，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譯，〈東南亞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10 月），頁 132-135、160-161。本論文於行文中以配合時代稱呼當時國家政權。

² 《淮南子》，〈人間訓〉，收於世界書局編輯部編，〈新編諸子集成〉，第 7 冊（台北：世界書局印行，民國 67 年 7 月，新 3 版），頁 322。

³ 王賡武著，姚楠譯，〈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 年 4 月），頁 20。

⁴ 司馬遷撰，〈史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民國 64 年 3 月），卷 229〈貨殖列傳〉，頁 1329。

行可四月，有邑廬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謠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廬國。自夫甘都廬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⁵

根據這段記載，可知自漢武帝以來，中國就已經知道有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存在及其相關位置，至於這些國家的確切位置，學者考證頗多歧異，今援用一般人較為接受的看法，認為都元國即為今越南沱瀾，即土倫（Tourance），現名峴港；邑廬沒國為今泰國叻丕（Ratburi）；謠離國為今緬甸丹那沙林（Ternasserin）；夫甘都廬國為今緬甸卑繆（Prome）；黃支國為今印度建志補羅（Kanchipura，今為 Conjeveram）⁶。而這一條航線，即所謂的「通夷海道」，是公元前 122 年漢武帝接受張騫的建議，決定溝通從四川經雲南到印度的陸路交通，因受到雲南昆明夷的阻撓未成，而另辟闢了一條經由海路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線，與北面的「絲綢之路」遙相呼應。雖然，尚無任何資料記載當時中國商人曾經涉履當地，更無華人移居該地的跡象。然而，「通夷海道」的開闢，是中國國際遷移活動在發軔初期所開闢出的三大遷移路線（絲綢之路、通夷海道、中一朝一日路線）之一，它提供了日後遷移者流向上的一個基本的知識⁷。而泰國正處於這條路線之上，使華人在早期向外發展時，親履泰土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中國正史中最早遣使東南亞的記載始於《三國志》中的〈呂岱傳〉：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檄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⁸

呂岱平交州為黃武 5 年（西元 226 年），他被孫權改派屯長沙渚為黃龍 3 年（231 年），故這次遣使應是西元 226-231 年之間的事。而關於扶南的位置，眾說紛紜，最初西方學者認為它是位於現代的泰國，但經艾莫涅（Etienne Ay Monier）和伯希和（Paul Palliot）的考證，認為扶南的疆土及後來的真臘都是位於現在的柬埔寨地方⁹，而陳序經認為，在三世紀的初期，扶南的領土大幅擴充，其北佔有現在的

⁵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錢大昕考異，《漢書補注》（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民國 64 年 3 月），卷 28 下，〈地理志〉下，頁 68。

⁶ 朱杰勤著，〈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載朱杰勤主編，《中外關係史論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70-77。

⁷ 朱國宏著，《中國的海外移民——一項國際遷移的歷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41、50-51。

⁸ 晉陳壽撰，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大昕考異，《三國志集解》（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民國 64 年 3 月），卷 60，〈呂岱傳〉，頁 12。

⁹ 陳序經著，〈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與其有關的東南亞諸國史〉，載陳著，《陳序經東南亞古代史研究合集》（上卷）（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行，民國 81 年 12 月，臺灣初版），頁 529-530。

老撾南部部分地區，其東北直至林邑，其西北可能伸張到暹羅的東北，其西南則可能擴充至暹羅的西部或是緬甸的東南部，而最南可能擴充到馬來半島的馬刺呷一帶¹⁰。也就是說，它雖然不是泰族所建立的國家，但在三國時代，它是暹羅灣的主人，控制著從交趾支那到馬來半島的所有土地，可說是當時東南亞最強大的國家。在三國時代，扶南曾三次遣使吳國獻禮修好（225、226-231 之間、243 年），與吳國建立了往來的外交關係，而吳國的遣使扶南，則以朱應、康泰的出使較受矚目。朱應、康泰出使扶南一事，學界曾作熱烈的考證，意見尚未一致，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朱、康的出使扶南應是在西元 244-251 年間的事，而其往返時間可能要三年以上¹¹。此次出使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將所經歷及所傳聞的百數十國都詳細的記錄下來，朱應撰寫了《扶南異物志》，康泰撰寫了《吳時外國傳》¹²，首次將南海諸國的地理風俗，尤其是扶南國的許多珍貴見聞，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這兩本書雖已失佚，但部分內容仍散見於一些古籍之中。據估計，朱應《扶南異物志》可能在西元七世紀中葉時失傳，而康泰的《吳時外國傳》則一直到西元十世紀時才失傳¹³。這兩本書的問世，使中國在西元三世紀中葉以後，對扶南的政治、法律、風俗、交通、貿易、物產、地理、對外關係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開啓了中國與扶南長期密切的往來。

自朱、康出訪之後，中國與扶南的關係進入了另一階段。自此以後，扶南對華遣使朝貢，史不絕書，除對三國吳國遣使 3 次外，兩晉期間共遣使 6 次、劉宋 4 次、蕭齊 1 次、蕭梁 10 次、陳朝 3 次。而由以上可知，在南北朝蕭梁時期，是中國與扶南往來最密切的時期，平均間隔 5.5 年扶南即遣使來華一次¹⁴。雙方交往之所以頻繁，一方面是六世紀的扶南，「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¹⁵，在僑陳如闍耶跋摩（478-514 年）及留陀跋摩（514-550 年）時期，扶南控制著南海的貿易，並積極與中國發展朝貢貿易。而另一方面，此時期佛教在扶南日益興盛，而中國正值梁武帝時期，梁武帝是有名的崇佛帝王，好佛之名，遠播海外，在他的感召下，佛教高僧，如僧伽婆羅（僧養）、僧曼陀羅（弘弱）、拘那陀羅（真諦）等，先後從扶南到中國弘法譯經，而梁武帝亦非

¹⁰ 同上註，頁 531-532。

¹¹ 趙和曼著，〈《吳時外國傳》考釋〉，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編，《東南亞史論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6 月），頁 174。

¹² 康泰的《吳時外國傳》，在後世文籍中引用時，有不同的名稱，如《扶南記》、《扶南傳》、《外國傳》、《扶南土俗》等，詳參同上註，頁 175。

¹³ 趙和曼著，〈《吳時外國傳》考釋〉，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編，《東南亞史論文集》，頁 177。

¹⁴ 周中堅著，〈中東友好關係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公元六紀蕭梁時期的中東關係〉，載中國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編，《東南亞史論文集》，頁 160。

¹⁵ 楊銜之撰，《洛陽伽蘭記》，卷 4，永明寺條，轉見陳顯泗等編，《中國古籍中的東埔寨史料》（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8 月），頁 30。

常重視到國外迎進經像和聘請高僧，如天監元年（502年），派決勝將軍郝騫等八十人到印度迎佛像¹⁶，大同年間（535-546年）又派張汜為特使到扶南迎回名僧真諦及經籍，武帝在京城特設「扶南館」作為接待扶南使者的賓館和扶南高僧的譯經場所¹⁷，由此反映了中國與扶南關係的密切。而由於梁武帝崇佛緣故，佛教在中國民間社會大為興盛，從而出現了「聖物貿易」，即用於寺廟禮儀中的香料（沉香）、以象牙或檀香雕製的舍利塔與佛像，以及琉璃瓶等與宗教儀式有關的物品的貿易。這些商品大多從西方輸入扶南，再轉口輸入到中國。「聖物貿易」的興起，使中國的南海貿易在商品性質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從一種完全經營皇室奢侈品的貿易，轉變成為無數佛寺信徒所需求的商品貿易，使中國的南海貿易市場大為擴張¹⁸。市場的崛起，促進了商人趨利貿易行為的出現，南海貿易由從前的偶發性行為轉變成隋唐之後的經常性活動，這種轉變使華人前往南洋商賈，進而定居當地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中國北方對南海商品在中斷了三百年之後，重新獲得了輸入，好大喜功的隋煬帝為獲得南方的奇珍異寶，即位之初，即「募能通絕域者」，大業3年（607年），煬帝派遣了一個使節團，在常駿率領下，攜帶了五千匹絲綢，經由海路，前往赤土¹⁹，受到赤土國王的盛宴歡迎。回程時，還帶了赤土王子隨行晉謁煬帝。常駿此行，重新開啓了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大門，南海貿易在帝王的鼓勵下，進入了繁盛的階段。

唐代初年，由於國勢強盛，許多東南亞國家紛紛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如位於湄南河流域的墮和羅國（Dvaravati）於貞觀12年（638年）、23年（649年）紛別遣使來華貢方物，位於馬來半島北部的盤盤則於貞觀9年開始遣使來朝貢方物等²⁰。由於南海貿易的空前繁榮，唐朝因而於廣州特設市舶使，負責對東南亞等地的貿易事宜²¹，這是中國對海外貿易專設官吏管理的開端。但是，唐朝時南海貿易的控制權

¹⁶ 李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本，1959年），卷657。

¹⁷ 扶南館的「台城遺址」在今南京雞鳴寺後面，中國歷史博物館存有照片，見陳炎著，〈唐代以前中國和東南亞的海上交通—兼論中國絲綢從海路傳入東南亞及其影響〉，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編，《東南亞史論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頁65、75。

¹⁸ 王賡武著，姚楠譯，《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頁74-82。

¹⁹ 西元七世紀時，扶南已經衰亡，真臘尚未崛起，原屬扶南屬國者，紛紛脫離扶南獨立，暹羅灣沿岸興起一些如盤盤、丹丹、狼牙修，赤土等等小國，尤其以赤土填補了扶南衰亡後留下的貿易真空。赤土者，位於今泰國馬來半島上的宋卡附近。詳情請參王賡武著，姚楠譯，《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頁95-99。

²⁰ 劉昫撰，《舊唐書》（三）（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民國64年7月），卷197，〈列傳〉147，「墮和羅」條，頁2633。

²¹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第21冊（台北：鼎文書局印行，民國66年），〈方輿彙編邊裔典〉，卷89，「南方諸國總部彙考」，頁903。